

第八章 結 論

南北文化之爭有其歷史淵源，東漢、三國江南意識逐漸抬頭，晉室南遷則徹底改變以往東西向爲主的地域文化競爭結構，不僅在當時造成一系列劇烈的南北文化優劣論，更以一種潛伏的力量持續左右著中國歷史文化之發展。十六國諸胡因文化自信不足而未敢真正與南朝爭鋒；拓拔氏崛起，改「代」稱「魏」，不再奉晉正朔，遂使南北政治文化之爭逐漸白熱化。孝文帝繼位以後，積極肇新國體，推行漢化，不僅遷鼎嵩洛，更遍祭名山大川，及華夏列祖先賢，以儒家道統論證北魏政統，尋求建立一套隸屬華夏的政治信仰體系。孝文帝太和文治除了扭轉、突破北方的夷夏關係與文化大防之外，更使得北朝漢人知識分子必須認真思考北魏的歷史定位，同時進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辯證，進而創造出新的文化想像與身分認同，並站上洛陽古都的歷史高度俯瞰南方文化，故而形成一系列的北朝正統論述，這些內容皆具體反映在《水經注》、《洛陽伽藍記》、《魏書》三書之中。三書自五世紀以來並存於世近一千五百年，或許是因爲彼此性質之差異過大，使它們幾乎是各別分立的存在，從未共同形成一張研究網脈。由於台海歷史之困惑給予文史工作者的啓發，筆者隱約察覺三書蘊而待揭的內在聯繫，即三書分別隸屬於「北魏洛陽時期」、「東魏遷鄴時期」、「北齊代魏時期」，論其成書時間先後間隔不過三十年左右，但卻是南北朝政治社會急遽變遷、文化正統爭奪最爲劇烈的期間，而三書也各按其時地回應了當時的歷史課題。

論三書的臨史心態

《水經注》是北魏洛陽時期的作品，文章始終洋溢著太和以來的榮美輝煌與雍容自信。雖說酈道元看盡國家極盛而衰，然隨侍孝文帝北巡的特殊經歷及其實際參與漢化的過程，使之特別能夠體會孝文帝所極力推崇的儒家「德化四鄰」的政治主張與「學在四夷」的文化態度，因而在面對政治社會危機之際仍能保持決

泱大國的氣度，以緬想過去，展望未來的文心繪製帝國大一統版圖。

楊銜之於武定五年，即京師遷鄴後的第十三年，因公務重返洛陽，不料映入眼簾的盡是滿城荒址，而不見任何昔日風華。歷史鉅變的百感激發出楊銜之強烈的文化使命感，遂以匹夫之筆發願著書，毅然跳進改朝換代的歷史漩渦中，回顧四十年洛城風雲。《洛陽伽藍記》以伽藍建築附繫人事糾葛，從光宅嵩洛寫到皇輿遷鄴，文中既有對佛寺林園的美好記憶，亦有對王朝興衰的痛心反思，更有對亂臣賊子的春秋褒貶。在官修史書態度不恭的疑慮之下，楊銜之悉心釐整其所理解認知的北魏興亡史，然卻也因其對洛陽政權的深厚感情，竟然不願直視歷史癥結，而改以「天意」詮說歷史的頓挫，臨史掙扎表露無遺。

北齊新篡魏祚，亟欲強調政權繼統的合法性，並於三國爭鼎之際鞏固太和以來的正統論述作為政治號召，因而詔令魏收撰史。目的除了貶抑蕭梁、西魏之外，更想壟斷歷史解釋權，定義高氏父子的王霸功業，彰揚後世身名。在此情況之下，只要收書能夠符合高氏立場，高氏父子對於魏收修史的惡行置若罔聞，致使後人頗以收書為穢。

論三書對洛陽政權的立場

酈道元躬逢盛事，親眼見證洛陽古都歷劫重生，故而以充沛的歷史情懷在〈洛水注〉、〈穀水注〉兩篇為北魏洛陽城留下珍貴記錄，其中〈穀水注〉更多達七千餘字，實開《洛陽伽藍記》之先河；而其對城內河川水利、漕運交通、城門宮殿、街市園林、寺觀廟塔、建築風貌，以及人文掌故的描述，不僅創造、擴大國族空間，更反映當時北魏的社會意識型態與集體文化認同心理。

只要比較〈穀水注〉中酈道元眼前那座宏美壯麗的城市，便知身為北魏臣民，又曾親歷洛都盛景的楊銜之，而今目睹城郭崩毀、寺觀灰燼、牆被蒿艾、人走地荒、遊兒浪蕩於市廛、耕老種地於官闕……的景象，執筆撰書之際必然帶著很深的失落感，而以一种沉鬱惋嘆的筆調，深情款款地和眼前殘廢的人、事、時、地進行極具張力的「敘舊」。

《魏書》的寫作刻意避開北魏洛陽城的人文地景，企圖弱化舊朝記憶，創新國族歷史。不過，書中對於北魏遷都的過程卻有很詳盡的記載，可見魏收對於盛極一時的北魏洛陽政權並非一無所感，只是礙於史官身分，必須配合新朝的官方立場，冷淡處理這座充滿人文記憶的歷史古都，因而形成有別於《水經注》、《洛陽伽藍記》之外的官方記憶。

論三書的正統架構

酈道元身為漢裔，徘徊民族大義與歷史現實之間，對於南北正朔自有評斷，並不完全採納北魏官史主述的正統歷運。書中雖未有明確之個人意見，然卻透過南北朝年號的使用體例委婉傳達其理念：孝文帝即位以前不視北魏為唯一正統，宣武帝繼位以後態度又趨於保留；至於南朝方面，記北魏太和以前事常用南朝年號，太和之後則幾乎不再使用，此中應有微意。

楊銜之是典型的北朝正統主義者。《洛陽伽藍記》不僅遣詞用字嚴明正偽與華夷之別，同時強調北魏對中原地域與洛陽古都之佔有，更凸顯其對前朝文物與儒家學術遺產之繼承，並用萬國僧民來華朝聖標舉北魏的國際地位，以及宋雲、惠生出使西域，重新開通漢末以來斷絕三個世紀的中西交通，證明北魏才是當時唯一正統王朝。

魏收以〈序紀〉開篇，追述拓拔先世與華夏的關係，將之納進華夏範圍，並透過地域佔有及順應天時強調北魏入主中原的正當性，更藉由歷史文化的繼承、延續、發揚聲稱北魏是唯一華夏紹述者，同時凸顯北魏對「中國」名號的繼承以強化其正統地位。然此架構卻也因齊、魏之間的繼統矛盾，必須以孝文帝崩逝為界，將北魏歷史切割成兩階段。魏收對於前半段歷史多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，至於後半段則負面看法居多，以致於不得不承認北朝歷運曾一度低靡的事實。而這種突兀自與魏收亟欲替北齊篡魏尋求合理解釋，營造天命移轉有關。

論三書的民族認同

酈道元以儒家大一統文化理念為其民族思想的準則，跳脫狹隘的種族論，但

以禮樂教化之程度作為判別正統的必要條件，以致於他的民族認同充滿流動性，完全不受南北朝政治對立及種族血緣差異的影響，也因此正統歸屬的問題上呈現出先視南方晉、宋為正統；後又改以北魏孝文帝為正統；而宣武繼位之後的南北朝雙方則顯然均未達標準，因而陷入猶豫不決之中。

楊銜之澈底切割平城與洛陽的歷史牽連，避談北魏的祖源問題，因而營造出一種北魏王朝彷彿是從洛陽肇始的印象。他除了透過北魏對華夏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強化其正統形象，更進一步透過北奔入洛的王肅、蕭綜等人去營造南方人士對於北朝政權的認同。不過，此舉反而也凸顯了楊銜之對自我身分認同的建構其實存在著焦慮，因而需要藉由各種方式反覆辯證。

魏收雖然以少數民族為其記述之主體，但是卻完全以華夏文化本位為軸線去建構史論。《魏書》內容除了具體地為拓拔氏建構民族身分認同，創造相關的歷史記憶，從根基上證稱其隸屬「華夏」，也反映出華夏子民在歷史心性的作用之下，經由想像將拓拔氏視為流落在外的炎黃後裔，承認彼此係血脈相連的兄弟民族，進而共同形成「我族」認同，甚至是新的民族意識。而鮮卑氏族對舊有國家祭典制度的揚棄及華化，也表明其渴望融入華夏文化系統，決心成為漢民族的強烈意志。

論三書對江左文化的態度

酈道元作為一位天生的山水美學主義者，配合北魏太和文治以來遼遠的政治視野與寬容的社會思想，終能以審美的眼光及開闊的文化胸襟，過濾掉南北地域文化之爭的負面情結，以及現實處境上政治對立的束縛，轉而環抱、察納南方山水，欣賞其地域文化之佳美，因而開創出巨大的地理空間美學與歷史文化格局，也為爾後南北文化的融合樹立了絕佳典範。

有別於北魏洛陽時期的從容自信，京師遷鄴以後的政局不安造成北朝人士的文化信心相對弱化，再加上蕭梁專事衣冠禮樂，長期以文化正統為號召的競爭壓力，更使南北朝之間的政治文化角力更甚以往。尤其東西分魏以後，南北朝的交

聘反而達到前所未見的熱絡，不僅交流切磋的機會大增，同時在國際外交場合中更是各自矜標，以凌駕對方來增國之光。楊銜之生處在這種社會氣氛之下，書中除了百般挑剔南方文化，對入洛南士亦是極盡嘲諷，甚至屢見誇張不實之誣蔑，以及情緒性的攻擊字眼，以致於成為偏激的北朝正統主義者。

《魏書》的寫作期間適值北齊鼎盛之際，反觀南朝卻遭遇侯景之亂，諸王內鬥，導致最終不得不奉齊正朔以利自保；加上梁元帝遷都江陵之舉，更是形同放棄兩百多年的建康文化圖騰。這樣的歷史轉折也使得魏收在立論南北文化之際，顯得義正辭嚴，甚至信口將南朝貶為蠻夷之邦。然而江左風流絕非政治意識型態可以蒙蔽，包括溫子昇、邢邵、魏收「三才」在內的北朝文人，無不私下傾慕南朝文學而加以學習，以致有魏收在史學上藐視南朝政權，在創作上卻規撫南朝文學的矛盾心理。

概觀南北朝文化之爭係受政治正統之爭激化，中國雖說是個執著於大一統的國家，但分裂與統一的時間卻各占歷史之半，因而正統之爭無時不在，其中又以南北朝最為明顯，也最具典範性，許多立論正統的說法都是北朝人士所提出，並成為後世爭辯正統的重要理論依據。然此事實卻在崇南抑北，普遍視南朝為文化主體的研究視野中一再受到忽略。本文合議三書，透過各書的臨史心態、政治立場、正統架構、民族認同、文化態度等問題的發掘與對照，重新審視南北朝文化之爭的內涵。盼望這樣的研究成果不僅能擴充三書的文化蘊涵，也能呈現出有別以往的研究新視野。限於學力，力所未逮之處必然甚多，由衷期盼大方之家的批評和指正。